



比較文學與文藝學叢書

TAZHE DE YANGUANG

LUNBEIMEI HANXUEJIA GUANYU SHIYANZHIZHUYANYIGUANXI DE YANJIU



『他者』的眼光

——論北美漢學家關於『詩言志』『言意關係』的研究

馮若春 著

四川出版集團
巴蜀書社



比較文學與藝術學叢書

四川大學“211工程”重點建設學科項目

“他者”的眼光

——論北美漢學家關於“詩言志”“言意關係”的研究

馮若春 著



四川出版集團
巴蜀書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他者”的眼光——論北美漢學家關於“詩言志”“言
意關係”的研究 / 馮若春著. —成都: 巴蜀書社, 2008. 3
(比較文學與文藝學叢書)
ISBN 978-7-80752-108-2

I. 他… II. 馮… III. 古典文學—文學研究—中國
IV. I206.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8)第 017395 號

“他者”的眼光

——論北美漢學家關於“詩言志”“言意關係”的研究

馮若春 著

| | |
|------|--|
| 責任編輯 | 李 蓓 |
| 出 版 | 四川出版集團巴蜀書社 成都市槐樹街 2 號 郵編 610031 總編室電話: (028)86259397 |
| 網 址 | www.bsbook.com |
| 發 行 | 巴蜀書社 發行科電話: (028)86259422 86259423 |
| 經 銷 | 新華書店 |
| 印 刷 | 四川五洲彩印有限責任公司 電話: (028)85011398 |
| 版 次 | 2008 年 5 月第 1 版 |
| 印 次 | 200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
| 成品尺寸 | 203mm×140mm |
| 印 張 | 9.625 |
| 字 數 | 230 千 |
| 書 號 | ISBN 978-7-80752-108-2 |
| 定 價 | 23.00 圓 |

本書如有印裝質量問題, 請與工廠調換

《比較文學與文藝學叢書》編委會

主 編：曹順慶

編 委：馮憲光 王曉路 李 怡

徐新建 劉亞丁 閻 嘉

吳興明 劉文勇 段志洪

秘 書：姜 飛

目 錄

| | |
|--------------------------------------|---------|
| 導 論 從問題入手研究北美漢學理論資源 | (1) |
| 一 海外漢學與中國古代文學理論研究 | (1) |
| 二 北美漢學家對中國古代文論的“詩言志”、“言意關係” 問題的研究 | (23) |
| 第一章 中國古代文論“言意關係”的重要命題——“詩言志” | (47) |
| 一 重新審察“詩言志”的含義 | (48) |
| 二 “詩言志”的藝術生產語境 | (60) |
| 三 “詩言志”說的歷史文化建構 | (71) |
| 四 “詩言志”說的審美意義內涵 | (77) |
| 第二章 文學獨立以後的“言可盡意”與“言不盡意” | (101) |
| 一 文學獨立以後“詩言志”的意義傾斜 | (102) |

漢學研究與中國古代文學理論研究

導論 從問題入手研究北美漢學理論資源

一 海外漢學與中國古代文學理論研究

作為一門獨立學科的中國古代文論研究，從1927年陳鍾凡《中國文學批評史》的出版算起，業已有逾七十年的歷史。七十多年來，古代文論研究，經歷了由疏入密、由淺趨深的不斷發展、成熟的過程，儘管其間也有失誤、低谷，但是無論是批評史的編撰，還是專題和範疇研究的廣度與深度以及資料整理等方面都成績斐然，自成格局。這一點，不少學者都已經有所總結^①。

^① 見張海明《回顧與反思——古代文論研究七十年》，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年，第19—43頁。

在二十一世紀，中國古代文論的研究如何在已有的豐碩成果上實現自身的超越，取得實質性的突破，已成為當下古代文論研究學科面臨的重大課題。

當今社會已經步入全球化的信息時代，科學技術的進步與發展為不同文化區域人們的信息資源的便捷共享、流通提供了可能。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們之間的交流前所未有地頻繁，人們的視野在這種跨文化的交流中得到不斷拓展，對自身文化和他者文化的相通性與差異性的認知也同步推進，“他者”成為自我觀照不可或缺的參照系。因而，中國古代文論的研究要實現新的突破，不能單純從縱向上打通古今，還要在橫向上融匯中外，充分利用、借鑒海外漢學研究者從不同角度應用西方現當代文學理論對中國古代文論的翻譯、闡釋和研究所得，從不同文化的語境中反觀自我，形成一種綜合的、立體的研究。令人遺憾的是，這方面的工作還相當薄弱，不能盡如人意^①。

海外漢學家的古代文論研究，已經不是外國人對中國文化的一知半解，而是已形成一個獨立學科，進入了西方現代學術體制。事實上，世界上第一部研究中國古代文論的著作並不是中國學者陳鍾凡的《中國文學批評史》。在陳著問世之先，日本學者鈴木虎雄就在1925年出版了《支那詩論史》。中國古代文論的漢學研究在亞洲，特別是在東亞的日本、韓國，有較長的歷史。而在二十世紀的後半期，歐美國家的漢學界對中國古代文論的研究深度和廣度都有所拓展，出版了一批成果。

^① 張海明《回顧與反思——古代文論研究七十年》，前引書，第159頁。

樂黛雲說：“中國古典文學研究長期以來大多在一個封閉的體系中進行，直到二十世紀，王國維、宗白華、朱光潛、聞一多等前輩學者從西方找到新的語境，擴大了視野，重新觀察中國文學的豐富遺產，為中國古典文學研究開創了嶄新的局面。但以往數十年，我們多半熱衷於探討西方的理論，試圖用西方理論的精華來重新審視中國文學，對於西方人在西方文化語境中對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的實績則重視不足。這一方面由於‘祇有中國人纔懂得中國文化’的封閉保守思想在作怪，另一方面，也由於過去西方漢學家的興趣往往集中在中國歷史、哲學、藝術、考古等方面；二戰以來，漢學研究又與中國現狀研究相結合，更多注重現當代文學，古典文學的研究成果并不十分引人注目。但是，近十年來（引者注：此文發表於1996年），情況有了很大變化，隨着一代新漢學家的崛起，在西方文學理論迅速更迭的語境中，西方有關中國古典文學的研究，取得了相當突出的成就，這些成就形成了一個新的參照系，在很多方面足以啟發我們對中國古典文學進行新的思考。”^①在中國對外開放的進程中，其學術文化研究逐漸步入全球化的文化語境。這是中國現代學術研究不能忽視和脫離的文化語境。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沒有全球化的文化視野，而是閉目塞聽，固守本土視野，就會“不識廬山真面目，祇緣身在此山中”。西方漢學對於我們中國學術界提供了一種“他者”

^① 樂黛雲《北美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名家十年文選序》，見樂黛雲、陳珏編選《北美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名家十年文選》，江蘇人民出版社，1996年，“序”第1—2頁。

的眼光，他們用異質文化的立場來審視中國古代文論，的確能夠給我們提供一些新的思維角度和新的問題。

文圖 西方漢學的“他者”的眼光是有特色的。宇文所安（Stephen Owen）說，作為西方的學者研究中國文學的著作，“最有價值的方面常常是它所體現的思維習慣：提出了什麼問題，用什麼方法來解決這些問題”。這些學者一般都在教授西方文論，當他們研究中國文學時，就把兩種文化傳統連接到一起來了。對於他們自己，也是在進行着“在者”與“他者”的對話。“在一個更大的規模上，所有西方學者對中國文學的研究都是用的這種方式。我們的環境，我們生活於其中的文化，我們必須與之交談的學生和同事，自然形成了我們探討中國文學的一種方式。當這種方式處於最佳狀態時，它能為中國文學提供新穎的觀點，既不離奇，也不牽強。”^① 他的這番話可能有些過於自信。海外漢學的研究成果並不是十全十美的。他們有些時候是以分析中國文論來證實西方文論的正確性，而具有一些偏頗之處。但正如國內學者指出的，這些著作的特殊價值在於：首先，具有一種“他者”的眼光，其考察問題的角度，是將中國古代文論作為一種異質文化的產物或表現來進行考察，這是國內學者無法辦到的；其次，採用有別於國內慣常使用的方法、手段進行研究，因此，這些研究往往導向新的理論層面的思索，形成與我們相似或大相徑庭的觀

① 宇文所安《神女之探索——英美學者論中國古典詩歌序言》，見莫礪鋒編《神女之探索——英美學者論中國古典詩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1—4頁。

點、看法，為我們提供有價值的思考，從而觸發和深化我們對問題的認識^①。

漢學研究在方法論上的探索，其價值尤為突出。任何文學理論都不是從文學現象中生成出來的，而是依托於哲學理論，從哲學的一般理論及基本理論中延伸和展開來的。西方哲學從傳統的形而上學到二十世紀對西方傳統邏各斯中心主義的反思，都是西方理性化思維方式的產物。中國和西方在思維方式上有所不同，這是古已有之的。安樂哲（Roger T. Ames）說：“中國文化作為一種人類社會秩序迥異於西方文化”，“中國文明在成長和發展過程中，一直有一套不同於西方的預設觀念（presupposition）在起作用”^②。西方漢學家在中國古代文論研究上一般采用人文主義和科學主義結合的方法，特別是使用現代科學的概念方法，運用西方學術概念、邏輯歸納等傳統治學方式來對重感悟印象、不羈於規律、不屑於條分縷析的體系建構的中國古代文論進行概念、原則、理論的規範，從總體上提供了一種異質文化的“他者”眼光。

比如中國古代文論在自身的形態發展中提出過不少文論的術語、概念和範疇，但是在古人那裏往往祇注意使用這些概念，而很少從理性邏輯上去加以清晰的界定和系統的闡釋。對這一個長期困擾中西方學者的重要問題，漢學家從不同的角度表達了自己

① 張海明《回顧與反思——古代文論研究七十年》，前引書，第244—245頁。

②（美）安樂哲《和而不同：比較哲學與中西會通》，溫海明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18頁。

的觀點。李又安 (Adele Austin Rickett) 非常關注中國文論的術語問題，早在 1968 年她就發表了關於這一論題的論文《中國文學批評專業術語》(“Technical Terms in Chinese Literary Criticism”)，分析造成西方學界困擾的原因^①。而後，在她編輯的論文集《中國文學方法——從孔子到梁啟超》(*Chinese Approach to Literature from Confucius to Liang Ch'i-ch'ao*) 中進一步指出，“對文學批評語言的理解是關鍵”，呼籲學者的主要任務就是“被中國作家如此優雅、不以為然地使用的精緻的隱喻性語言，必須得到闡釋和澄清”。她認為該任務已得到時下漢學家的認同，《中國文學方法》論集中半數以上的論文都在從事規範、厘清中國文論術語的嘗試：有對古老的哲學範疇“氣”的原初概念及其在不同時期被持不同觀念的哲學家引申、生發出的不同意義內涵的專題探討；有通過對韓愈的“奇”和歐陽修的“常”這組相對的概念分析，切入由唐及宋的“古文”理論發展的研究；有從作為一種方法來理解被中國詩人廣泛採納和推崇的模仿現象的角度，對黃庭堅的“脫胎換骨”這一隱喻性術語的廓清；也有對王夫之“情”、“景”術語在整個中國文學中的意義的闡明^②。宇文所安在《中國文學思想讀本》(*Readings in Chinese Literary Thought*，大陸中文譯本書名題為《中國文論：英譯與評論》) 中對這些漢學家規範中國文論術語的訴求動因進行了如此的詮

^① Adele Austin Rickett, “Technical Terms in Chinese Literary Criticism”, in *Literary East & West*, Ⅱ, 1968.

^② Adele Austin Rickett, ed. *Chinese Approaches to Literature from Confucius to Liang Ch'i-ch'ao*.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8. pp. 6-7.

釋：“西方文學思想傳統也匯入到整個西方文化的‘定義’的熱望之中，它們希望把詞語的意義固定下來，以便控制詞語。”“既然尋求定義始終是西方文學思想的一個最深層、最持久的工程，那麼，這種追尋在中國文學思想中的缺席（以及在中國思想史其他領域中的缺席）就顯得頗為驚人。”^① 這種努力、嘗試，為崇尚感性、意在言外的中國傳統治學作風提供了一種有效的補充，也為這門古老的學問走向當代、走向世界進行了有益的探索。目前中國學術界也在進行對於古代文論術語、範疇的研究，汪涌豪的《中國古代文學理論體系——範疇論》（復旦大學出版社，1999年）就是這方面的突出成果，但是該書在研究時若能參考西方漢學家李又安等人的成果，當會更上層樓。

然而，上述受過西方嚴謹學術規範訓練的漢學學者對中國古代文論的研究，並不代表西方的文學理論有着中國傳統所缺乏的而古代文論研究又必不可缺的系統性、理論性優勢，而是這些研究所能夠為中國古代文論的研究提供一個更為有利的觀察點，即“他者”的眼光。不同的思想傳統傳承着不同的文學理論，崇尚理性和體驗感性的兩種不同文化和美學傳統，造就了中西方文學理論在樣態上的差異。越來越多的學者認識到，中國的思想傳統和文學理論有着自己獨特的優勢。德里達曾發出中國沒有哲學的驚呼，但是在這裏他並沒有要區分中國和西方思想傳統高下軒輊

^① Stephen Owen, *Readings in Chinese Literary Thought*.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5. (美)宇文所安：《中國文論：英譯與評論》，王柏華、陶慶梅譯，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3年，第3頁。

的意思。他認為即便中國沒有西方邏各斯傳統意義上的“哲學”，而中國偉大的思想傳統不會因為名稱上的不同而有絲毫的貶損^①。現在越來越多的學者已經認識到，世界文化的多樣性、文化樣態的多元化是世界文化存在的正常狀態，不能把西方以古希臘邏各斯中心主義的理性主義文化模式，作為單一的先進文化來崇奉。中國文化和文論有自身獨特的高度理性發展的模式和形態。這正如張海明所說：“正是這類在西方以至現代文論中沒有相應術語的古代文論或古典美學範疇，構成了中國傳統文論和美學的主幹，集中體現了民族特色。”^②宇文所安也認為：“（中國文學批評）強調多樣性和個別性，用不同的方式處理不同的問題。而並沒有像西方那樣，形成系統的傳統意義上的概念系統。這不是中國文學批評的缺點，而正是它的特點。”^③所以，完全將西方文學理論中的術語、概念和範疇套用在中國文論之中，將中國文論置入與其自身毫不相干的西方文論範疇和問題框架中加以討論，以西律中，難免會有方枘圓鑿之弊。不少漢學家清醒地意識到這個弊端，從而立足於中國古代文論的特定語境，從跨文化的視角對之進行批評研究。

余寶琳 (Pauline Yu) 在《中國詩歌傳統的意象的解讀》(The Reading of Imagery in the Chinese Poetic Tradition) 中，

① 陸揚《中國有哲學嗎？——德里達在上海》，載《文藝報》2001年12月4日。

② 張海明《回顧與反思——古代文論研究七十年》，前引書，第121頁。

③ 轉引自張宏生《“對傳統加以再創造，同時又不讓它失真”》，載《文學遺產》1998年第1期。

認為“意象”的概念自中國詩學產生以來就是其關注的中心，而西方對這個話題的興趣是在相當晚近時纔出現的。她在梳理了西方文學發展的二十五個世紀的歷史，徵引了從柏拉圖（Plato）以來西方文學批評對“隱喻”（metaphor）和“寓托”（allegory）^①——與“意象”（imagery）相近似的術語——的理解與闡釋之後，得出這些術語完全不能直接適用於中國詩歌的“意象”的結論，西方理論家對待文學的態度是一種哲學的態度，這與中國批評家對待文學的審美態度相去甚遠。西方詩人是“maker”，是生產者，他生產和建構出來的是一個虛幻的世界，目的是將作家心目中存在的更高境界的理想具體化，如西方批評認為“寓托”中存在“本體論的二元性”（ontological dualism），“隱喻”中存在“兩個具有本體論差異的領域”（two ontologically distinct realms）；反之，中國詩人的標的是應和外在的世界，以“用事”（in literary convention）寫作，並且強調“類”（categorical correspondence）的類型，亦即內在世界與所描寫對象的一致，如意境等。二者在前提上是不同的^②。所以，在中西文化缺乏全面交流和相互理解的語境中，中西方文論的思維方式、哲學理念前提根本不同，導致若干中國現代比較文學研究者認為可

① 葉嘉瑩在《中國古典詩歌中形象與情意之關係》一文中將“allegory”譯為“寓托”，本文涉及“allegory”或“allegoresis”均採用此種譯法。見《迦陵論詩叢稿》，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30頁。

② Pauline Yu, *The Reading of Imagery in the Chinese Poetic Tradi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 3-42; 218. Also see Donald Holzman, “Review of *The Reading of Imagery in the Chinese Poetic Tradition*”, in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47 (No. 2), 1988.

以類同的相似概念術語在實際上也相差甚遠。高辛勇 (Karl S. Y. Kao) 在《修辭學與文學閱讀》中對於西方的比喻 (metaphor) 辭格和中國的“興”的差異性的認識，與上述觀點有異曲同工之處。他認為，西方的 metaphor 強調喻衣與喻體之間的距離，其特殊性就在於它能在兩種截然不同的事物之間建立關係，強調二者之間的離異隔絕性。在中國詩歌傳統中，與西方的 metaphor 相近似的辭格是“詩六義”中的“比”。但是“比”在中國文學傳統中的地位不及“興”，《文心雕龍》論及比興時說：“毛公述傳，獨標興體。”^① 因為與“比”相比較，“興”使文本內部的關係維持一種完全開放的情狀，在這個意義上的自由聯想讓詩歌既含蓄又富暗示性，正是“興”代表着中國詩歌所強調的審美價值，如含蓄、微隱、取義廣遠、意味無窮等等。而和西方的 metaphor 相比，中國詩人使用“興”這種手法時所涉及的兩個或者兩個以上的意象或事物，一般來說都具有“類同”的地方。即便喻衣和喻體之間都不是現實經驗的一部分，而這却被認為都是同“類”而可相通。“興”所引發的興趣和美感在於可以從不同的事物、經驗中看出它們的“類”同，使不同事物能夠通感相應，而不在於它們之間的斷裂與距離^②。海外漢學的這種研究和分析運用了西方學術規範，對問題的研究比較細緻，對於我們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① 劉勰著、范文瀾注《文心雕龍注》下，人民文學出版社，1978年，第601頁。

② (加)高辛勇《修辭學與文學閱讀》，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第68—72頁。

正是這種對中西方文化與文學的差異的視角和結論，使海外漢學在中國文化和文學的研究中成爲一個可供開發的資源。現代文化和文學的研究提倡對話與交流。作爲自我的在者和他人的交流與對話，顯然可以打開認識自我的一個新的渠道和角度。更何況，目前科技、思想、學術信息的交流日益全球化，西方文論的思想已經成爲中國學者研究中國文論的一種參照性資源。海外漢學是西方學者在西方文論語境下，對中國文化、文學和文論的認知和闡釋。對於我們中國古代文論的研究者而言，借鑒海外漢學研究中國文論的成果，比引進那些西方直接研究西方文學事實的理論更加切近我們自己的研究對象，也更有參照價值和對話意義。

海外的漢學研究是一種由西方基督教傳教士來到中國以後，開始研究中國文化所建立的學術傳統。這種從西方學術思維來看待和研究中國學術文化的傳統具有相當悠久的歷史。據朱謙之的《中國思想對於歐洲文化之影響》一書的考察，西方人對中國的這種考察和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十三世紀。1249年，勃拉奴克辟尼(Plano Carpini)奉羅馬教皇殷諾深爵第四(Innocent IV)之命出使現在屬於中國版圖的蒙古，並寫下遊記^①。1289年，約翰孟德高維奴(Jean de Montecorvino)奉羅馬教皇之命前往中國傳教，曾寫下三封信報告遠東情況，其中一封(1305年)發自現在的北京(當時北京被約翰孟德高維奴稱爲“干八里”(Cambalec))，該信“報告在契丹傳教並在京城建築教堂和領洗等事。最後一段極稱大汗之土地廣大，人口衆多，財富充

^① 朱謙之《中國思想對於歐洲文化之影響》，商務印書館，1940年，第8頁。